

回忆西路军

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中规定了由“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的作战计划。

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根据上述新的战略行动计划，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为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西路军的建制和装备情况如下：

总指军：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 郑义斋
卫生部长 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 宋侃夫
四局局长 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四 军长董振堂 政治委员黄超 参谋长李屏仁 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 政治委员朱金畅）十四师（师长郭锡三 政治委员谢良）共四个团 三千余人 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九军 军长孙玉清 政治委员陈海松 参谋长陈伯稚 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六个团 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

三十军 军长程世才 政治委员李先念 参谋长黄鹄显 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 政治委员张文德）共六个团 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每枪平均子弹二十五发。

骑兵师 师长董彦俊 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 枪二百支，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 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坚执锐，喋血奋战，历时近五个月之久。先后共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 任务不定 迟疑徘徊 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 鏖战一条山 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 共取宁夏 继则放弃这一计划 独力西进 准备打通新疆 再又停在永凉地区 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 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问，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

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85 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

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第二 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两军对阵，它是决定双方胜负存亡的关键一环。“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毛泽东选集》第401页）西路军的失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結果。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实践证明，这是我们争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违背了外线进攻作战的基本原则，丧失主动地位，一点也不奇怪。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估

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 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而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形成了近战、夜战、奔袭、伏击、迂回、猛打猛追等战术特长。扬长避短，才能百战不胜。但

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使这些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以凑奇效。就拿对付敌人的骑兵来说，我们一无机炮火力，二无伏击阵地，三无大量骑兵。优势装备的敌人，瞬间蜂拥而至，倏忽一啸而去。你想打个歼灭战谈何容易 敌人进攻 我军多用大刀同敌拼杀 消灭一个骑兵，往往要付出两三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跑掉 我们干瞪眼。用小部队追击 人家能杀“回马枪”用大部队追击 阵地就保不住。“虎落平阳被犬欺”。我军的战术特长失去用武之地，优势难以发挥，受制于敌，便是在所难免的了。

凡此种种，都是西路军丧失战场主动权的根由所在。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这句古话 指的就是军事指挥上的机断专行问题。寓于其中的经验教训，不知是用多少人的流血代价，才换来的。对于一支独立作战的军队来说，指挥员能否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机断专行，灵活制敌，往往能对战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战场实际纷云复杂，千变万化，许多重大问题，要靠身临其境的前线指挥员随机应变，“先斩后奏”果断处置。驾驭战局 指挥战争 如果不敢从实际出发 独立判断情况，定下决心，而是翘首望天，一切唯上，这叫盲目性、机械性。要想不受战争实际的惩罚，是不可能的。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的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 叫往东就往东 叫停就停 叫走就走 指挥员

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

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乘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放在依靠自己、依靠人民的基点上。“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毛泽东选集》第 1080 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贏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的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

（本文引自《历史的回顾》作者 徐向前）

历史的追溯

野心勃勃张国焘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后，长期蓄谋分裂红军的张国焘，极力倡导组成西路军向甘肃、宁夏以西地区挺进。在此后的岁月里，西路军经历极为艰难的战火考验，虽败犹荣，描写下了一幅壮丽的诗篇。为了主面揭露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首先还要看看张国焘是怎样走上分裂红军道路的。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党内一个老机会主义分子。他在参加党的初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他是一个野心家、两面派、阴谋家，因此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并不奇怪。党内出现张国焘、王明这类野心家、阴谋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训。

张国焘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并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 反对中央。

张国焘不仅是一个犯错误最多的老机会主义分子，而且 1924年 5月他在北京被捕后，就曾可耻地出卖了党组织，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案〔一 一〕三四九九所悉，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 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群宇、范鸿、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北京政变后，党乘机救出了京津等地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可耻的叛卖罪行。他在《我的回忆》中 甚至还把自己打扮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 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以‘不知道’

掩盖铁的历史事实，只只更暴露了其丑恶的灵魂而已。

时，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央的领导。为了贯彻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他们在所谓“反右倾”的纲领下，提拔“左”的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派遣代表，逐级夺权，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发展了机械过火的斗争。为了取悦王明等人，张国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攻击反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反谓反陈绍禹派为名 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 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大肆

宣扬“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他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小伙计。王明等人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很赏识，并认为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影响，可以拉他到小宗派里来，作为推行他们极“左”路线的得力工具。因此，王明等把持的中央，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来，他又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张国焘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的“钦差大臣”，他积极地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以罪恶的“肃反”乱杀革命同志，以及在军事上的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结果，丧失了党和人民英勇斗争所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猖狂的分裂活动

在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四方面军领导人与中央之间，对于会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张国焘曾两次致电中央，请中央“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请立发整个战略便〔一〕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

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 出长江 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甚至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是“右倾观点”就“应当严厉反对”。而中央的方针是北进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6月16日2时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

焘、徐向前、陈昌浩：“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文中说：“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电文最后说：“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张国焘收到中央上述电报以后，在 6 月 17 日又致电中央，提出了与中央意见完全相反的方针。他在电文中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东打条件，准先念能详告。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他主张“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或〕暂时利〔向〕南进攻”。

6 月 18 日 21 时，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这种错误主张，又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极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同日，总政治部在贯彻《赤化川陕甘计划下之战斗任务大纲》给各军团政治部

主任的指示中说：“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6月20日4时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向亦不必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名、邛、大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2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局面。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央是要向北向东，张国焘是要向南向西。中央充分考虑张国焘的意见，准备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商定。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2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战略。因此，中央军委于21日由懋功向两河口开，准备22日赶到，与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会面开会。中央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分别在6月23日和25日到达了河口。

中央政治局会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洛甫、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接着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博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洛甫）。”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

（一）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会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 控制这一地带 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6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进攻胡（宗南）敌的战役部署》：“目前进攻胡敌的战役”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向松潘及西北地区前进”。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为了执行两河口会议北上方针的战略决定，中革军委在 6 月 29 日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在岷江东岸、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钳制东、南两面之敌，主力则在 7 月 7 日至 13 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表面同意攻打松潘，实则避开敌人主力向川康边退却。他在 6 月 29 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虽然也同意攻打松潘，但强调攻松潘之困难，并要一军团去阿坝，四方面军主力往西往南。7 月 1 日张国焘又致电中央以“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7 月 8 日，他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蒙蔽事实真相，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关系，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接着，他策动他的支持者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司令部的人员名单，提出要“充实司令部”、“加强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给予其“独断决行”的大权，并宣称如不“集中指挥”便“无法顺利灭敌”对中央进行要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执行松潘战役的有利时机。7 月 10 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批评张国焘说：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中共中央批评了张国焘延误战机的错误，拒绝了张国焘等的无理要求；但从全局利益出发，为了照顾党和红军的团结，经 7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的总政治委员。7 月 21 日、2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芦花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作了四方面军情况的报告。

21 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任前敌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前敌参谋长，还决定一方面军的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

但张国焘继续阻挠红军的北上行动，并下令将同他作斗争而被关押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在卓克基秘密处死。21 日，为补救被张国焘延误的战机，中央军委发布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并对张国焘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张国焘才开始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

为解决由于张国焘破坏松潘战役形成的局面，中央决定在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此，张闻天在 8 月 3 日 21 时致电张国焘：“请准予明日 4 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沙窝会议于 8 月 4 日至 6 日召开。到会的有洛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议程有两项：（一）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会议之前已起草了沙窝会议决议草案，并与陈昌浩、傅钟等几人商量过，是得到同意的。会议首先由洛甫就决议草案作了报告，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8 月 9 日中央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任务关系到‘整个